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现实意义

刘美婕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青年作为核心参与者与建设者,其社会心态直接影响现代化进程推进。当前青年社会心态呈现积极与困惑并存的复杂性,培育青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新时代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其社会心态不仅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本质且内在的联系,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培育青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回应青年成长诉求与国家发展需求的双重命题。

一、基于“对位共栖”现实特征:夯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当前青年群体呈现的“对位共栖”状态,恰恰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进程中,青年心态的真实呈现,即“宏观自信”与“个体不易”的落差感并存,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在个体内部形成动态平衡。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让青年对国家前景、民族复兴充满信心,国家在科技创新、民生服务、国际地位提升等方面的成就,让青年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物质文明发展赋予青年的精神底气;另一方面,物质文明发展带来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婚恋压力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又让青年在个体成长中感受到现实不易,难免产生焦虑、迷茫、倦怠等消极的情绪。这种“宏观自信”与“个体不易”的并存,正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青年心态的集中体现。

立足这一现实,培育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尤其重要,我们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成

果,也要强化精神文明的引领作用;既要依托物质文明发展的优势,增强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也要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心理疏导,回应青年的现实困境和合理的利益诉求,实现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统一,在国家发展叙事与个体成长实践之间同频共振。这既是顺应青年心态的现实需要,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内在要求。

二、应对现代化转型风险:筑牢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交织的时代境遇,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叠加,既考验着全社会的心理韧性,也对青年群体的心态培育和信念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各种思潮碰撞交锋日益激烈,部分西方思潮借助多元传播渠道渗透蔓延,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输出,妄图消解主流价值认同、破坏意识形态安全,潜移默化影响着青年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认知水平。其中西方价值体系影响着青年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建设,其极力倡导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正借助影视作品、饮食风尚、节庆文化等多种媒介与渠道,悄然渗透并重塑着当代青年的价值立场。当青年长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浸染中,逐渐疏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产生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偏执极端、盲目跟风的消极心态。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结构正经历系统性改革,利益格局呈现深度调整与动态博弈

并存的复杂态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不断重塑社会分工与青年发展环境。在这一变革进程中,青年精神需求日趋复杂多元,更加注重精神满足与价值实现。历史与实践表明,精神旗帜不牢则容易迷失方向、丧失动力。

培育青年积极社会心态,是应对现代化转型挑战的重要保障,有助于青年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凝聚共识。它能激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内生动力,以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主动投身发展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抵御风险、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三、激发青年“挺膺担当”:强化民族复兴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复杂艰巨的任务与多重风险的挑战,迫切需要青年一代以主动姿态承担起时代使命。“社会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而人则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能动性地进行活动的,他们的心理状态必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生活。”青年能否肩负时代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心理状态影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激发青年持之以恒的行动自觉;而消极懈怠的心态则易催生回避退缩等倾向。由此可见,青年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并非附加性工作,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青年心理状态提出的本质要求与内在规定。

一方面,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严峻、改革发展使命繁重艰巨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价值观念重塑等多维转型与深层嬗变的关键阶段。各类风险挑

战相互交织叠加,内外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越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越迫切需要培育青年群体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引导青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昂扬的精神风貌直面风险挑战、主动担当时代重任。另一方面,回望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五四一代”到“革命一代”,从“改革一代”再到新时代的“强国一代”,中国青年始终紧跟国家步伐校准前行方向,在时代浪潮中奋力书写绚丽动人的青春篇章。

培育青年积极社会心态,正是对这一优良历史传统的赓续传承。身处新的发展阶段,广大青年不能做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安于现状的躺平者和消极被动的等待者,而是应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主动投身实践、勇于担当作为,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薪火相传。因此,青年是现代化的先锋力量,培育和塑造其奋发向上、敢于突破、开放包容的心态特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结语: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这一时期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对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生力军,培育其积极社会心态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个体层面来看,积极社会心态能为青年抵御成长困惑,突破发展瓶颈,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从国家与社会层面而言,这不仅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举措,更是凝聚青年力量、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的关键一环。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治理主动权交给农民——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性重塑的路径创新

黄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必须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这揭示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确立农民主体性地位,这亦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农民主体性双向互构,治理现代化稳固农民主体,农民主体性赋能治理发展。当下农民主体性建设受内外双重条件制约,发展受限。本文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剖析二者内在机理与现实困境,提出优化路径,助力重塑农民主体价值,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农民主体性的理论互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制度调整与技术工具叠加,本质是乡村治理逻辑与主体角色的整体性重塑。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原生主体,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依附关系,而是协同演进的互构关系。治理现代化为农民主体性生长搭建制度与现实场域,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推动治理模式不断优化革新,共同构成乡村善治的底层逻辑。

一方面,治理现代化是农民主体性的制度支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打破传统乡村治理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从制度演进、治理转型到数字赋能,为农民明确主体身份、拓宽参与渠道、提升行动能力。其一,制度演进赋予农民主体地位。乡村基层自治制度的持续深化,不断厘清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权责边界,从法律与制度层面确立了农民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权利。让农民不再是乡村治理的旁观者,而是拥有合法话语权的主体。其二,治理转型提升农民参与能力。乡村治理从行政管控向服务协商转型,治理不再只是下达政策任务,而是更多倾听村民诉求、回应村民需求。农民在表达诉求、协商决策、公共事务的参与实践中得到锻炼。其三,数字技术拓宽农民表达空间。数字化治理突破了传统乡

村治理时空受限。村务公开平台、便民小程序等数字载体逐渐普及,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反映生活难题、参与集体讨论,极大拓宽了农民主体表达与公共参与的现实空间。

另一方面,农民主体性是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策设计,但真正能让治理落地生根的是农民的自觉参与。其一,主体认同奠定治理的情感基础。乡土情结是农民天然的情感底色,当农民真正意识到乡村发展和自身生活福祉紧密相连时,便会跳出“事不关己”的旁观心态,主动关心村务、参与乡村建设。其二,参与能力保障治理的有效运行。乡村治理涉及各项繁杂事务,单靠基层干部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而当农民能够主动投身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来,便能有效填补治理末梢的空白,让乡村治理各项举措真正落地。其三,集体行动推动治理的实践创新。农民以集体形式参与治理时,往往能跳出思维定势,结合本村探索更接地气的治理方式。这些源于农民自身探索的本土化治理智慧,能够不断丰富乡村治理的实践形态。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性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乡村转型的冲击下,乡村人口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动,农民主体性培育与发挥遭遇阻滞。其中既有农民自身的短板,也有外部环境的支撑乏力,二者共同制约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从内生动力层面,农民在主体结构、参与意识与数字素养中存在结构性缺失。一是主体结构失衡。城镇化进程中吸纳了大批乡村青壮年群体,致使留守群体多为老人和妇女,治理参与群体呈现老龄化。青壮年作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大量外流造成了主体结构失衡、主体代表性弱化。二是参与意识模糊。农民受到长期自上而下的治理惯性从而产生了依赖心理,默认治理是政府和村干部的职责,

而自身只需被动服从安排。村民关注更多的只是个人家庭琐事,对村庄发展疏离漠视,主体责任观念淡化。三是数字素养欠缺。数字治理已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乡村农民普遍存在数字素养短板。多数农民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不会使用线上村务平台,难以适应数字治理。数字技能的缺失,让这部分群体被隔离在数字治理体系之外。

从外部支撑层面,存在基层组织活力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资源配置重物轻人、治理工具错位的支撑乏力。一是基层组织活力不足。村级自治组织是凝聚、引领村民参与治理的核心组织,但当前乡村基层组织存在活力不足、队伍结构趋于老化、年轻后备力量不足、部分干部对村民的实际需求把握不实。动员方式趋于固化,较多沿用行政化的传统路径,缺乏与村民之间的有效互动,难以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二是乡村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是吸引人才的重要依托,也是农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经济基础。在现实环境中乡村仍依赖传统零散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特色产业与集体经济支撑。农民收入渠道狭窄,没有多余时间和精力关心村务、参与治理,客观上压抑了主体性的发挥。三是资源配置重物轻人。乡村建设资源投入中,存在重硬件设施、轻人文培育的倾向。各地热衷于物质硬件投入,在农民公共精神培育、乡土文化传承等人力资本建设上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农民难以形成主动参与治理的内生自觉。四是数字治理工具与需求错位。乡村数字化治理建设存在治理平台界面繁琐、流程复杂等问题。平台设计多从管理出发,较少贴合农民日常使用场景。当农民认为操作麻烦自然不愿继续使用,数字赋能农民的作用就难以真正落地。

三、以农民主体性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创新

重塑农民主体地位、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需立足乡村现实,从组织、培育、保障三维度协同发力,破除现实梗阻,推动农民主体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组织引领层面,基层组织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载体。需摒弃片面政绩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导向,将农民意愿与幸福感作为治理评价核心。同时优化村级党组织队伍结构,吸纳返乡青年、乡贤等力量,转变行政指令式工作方式,在服务人民中凝聚民心。

主体培育层面,聚焦精神和能力提升。通过乡土文化活动重构乡村共同体意识,唤醒农民家园归属感。实施普惠性数字技能培训,补齐农民的数字短板。优化主体结构,吸引青壮年回流,搭建多元参与平台,让农民真正参与治理。

支撑保障层面,夯实农民主体性发展的物质基础。立足乡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减轻生计压力。调整资源配置导向,加大对“投资于人”的力度。优化数字治理平台,简化操作流程,让数字工具真正成为农民参与治理的便捷抓手。唯有如此,才能重塑农民主体地位,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走深走实。

四、结语

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守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激发农民创造力。二者互构共生,治理现代化为农民成长筑牢根基,农民主体性为乡村善治注入动能。当前乡村治理困境,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培育与发挥不足。唯有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强化组织引领、提升主体能力、健全保障体系,将治理主动权交还农民,方能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乡村治理贴合民心、更具温度。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